

《世陽堂》商王武丁古璽之發現

作者：伍錫強

古璽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遺存之一。官、私璽印在戰國秦漢期間大量湧現，並在藝術上登峰造極，影響極其深遠。至今印學界仍言必秦漢，考證與著述皆以上追秦漢為能事。可以說秦漢璽印之成就於今已是有口皆碑。戰國秦漢璽印之所以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是與當時經濟的發展、商業的發達、以及青銅器冶造技術的提高和文化藝術的繁榮所密切相關的。至秦漢時期，文字已從甲骨文和金文過渡至秦篆、漢隸、以至於楷書等各種書體，凡此種種，無疑都是璽印發展的必不可少之條件。







然而，一切事物都是按照其自身的規律發展變化的，璽印的產生、發展、與成熟也不例外。秦漢璽印達到如此高度的發展，其起源究竟始於何時？關於這一點，人們至今尚且眾說紛紜。有的人認為古璽印最早產生於戰國之時，其論據是這一時期無論官印還是私印，其數量之多，每以千計，並且均有很高的藝術造詣。也有的人則認為古璽印實是起源於商末周初，並以臺北中央研究院所收藏的“亞羅·示”和“翼子”等三枚銅質古璽作為主要依據。同時尚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古璽可能是源於古蘇美爾人的陶製滾筒形印章。毋庸置疑，對於中國古璽印的起源所以有如此之多的推斷無非是由于缺乏可供實物考證的早期璽印而致。



不久前，筆者有幸在紐約著名收藏家林緝光先生的《世陽堂》看到他所珍藏了四十餘年的中國古璽。這套古璽包括十枚骨製璽印和兩枚玉製璽印，均屬於歷史價值極高的稀世之珍。這些早期古璽，據其內容、製做之真人、型製以及字體風格等特征推斷，當是商王武丁之遺物，距今約有三千二百多年之久，為目前所傳世之最古老中國璽印。這十枚商代古璽以雄辯



的實物證據將我國古代璽印之起源確定在商王武丁時代，標誌著印學史及考古史上的具有現實和歷史意義的一大突破。





以下，筆者將就林氏《世陽堂》所藏古璽的型製及印文等諸方面，結合中國商代的篆刻藝術風格做一簡要介紹與初步探討。


一、商王武丁古璽十二圖文釋義

圖一釋文： (酋)、王令、爭()妹()內()埽()、允不亡()有。

“”酋，與酋方鼎銘文()可能是商王族徽記。




“王令”：“王”，甲骨文為“”，金文為“”《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釋：“王，天下所歸往也”。西漢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劃而連其中謂之王”。清代學者黃生則認為：“然以上古帝號言之，則皇先於王；以製字言之，則王實先於皇。疑古者以此為有天下之稱，如《易》云‘古者庖犧氏之天下也’。本但音旺，至三代取以為帝號，始轉平聲耳”(見《字義府合按》)。





在殷墟甲骨文發現之前，我國歷史上對於“王”字已有如此深刻的理解的確是十分難能可貴的。王國維先生也曾對甲骨文的“”字釋義為“王”，提出了武丁時的“”便是早期的王字。王氏這一正確論斷，對我們全面地認識甲骨文的含義至關重要。此璽文中之“”便是早期古璽印文的王字，可見當時的王字也可寫作“”與王權相結合為“王令”。“令”，命也，使也。《說文》釋之為“發號也”。

“內”：甲骨文“內、納”同文，均為“”，此處當為內，為武丁時貞人。



“妹”：為人名，與爭、內、埽同被武丁命為貞人，但他未在卜辭中出現過，這是一個新的發現，有待學者專家們進一步研究和證實。


可參閱卜辭文例“乙亥卜生四月妹有事”(見《甲骨文字典》以下簡稱《甲典》)。妹方應是商代後期殷人國都之所在。




“爭、埽”：爭“”甲骨文為。埽，甲骨文為。與埽均為武丁時之貞人。如卜辭文例：“己巳卜貞告方出於祖甲大乙”以及“乙丑卜埽貞翌丙雨”（見《甲典》）。


“允不亡”：甲骨文篇“允不”二字之合文為。如卜辭文例：“各雲不其雨允不啟”（見《甲典》）。“亡”之甲骨文為，亡即無也。是“允不亡”三字之合文。


“有”：甲骨文為、。這是一條驗辭，大意是武丁命接納爭、妹、內和埽為貞人。


圖二釋文： 戊庚從舟（）狩羊。


“”：這一羊字。可能既是族徽又是印文。其他幾枚鏤形璽印均於鏤蓋部位刻一族徽，可能此璽也沿其例。


“戊庚”：戊，甲骨文為，庚的甲骨文為、。戊庚是記日，即戊日至庚日三天。

“從”：甲骨文從此比同文、均為，此處走為從。

“舟”：甲骨文為。疑是舟之異構。卜辭中有“於舟（）絞雨”之例。舟為地名（見《甲典》）。





“狩”：甲骨文狩、獸同文，均為，此處應為狩。這是記載商王武丁的一次狩獵活動。商王到舟這個地方去狩獵羊群，為期三天。

圖三釋文： 邦壬寅。


“”：可能為邦方族徽。


“邦”：甲骨文為，，，。《說文》與《漢簡》均作。



。古璽文是為邦（）字之增繁。下加一橫為地，地上有田，田上有作物（如禾（）字上部之形），旁邊有界標。



“壬寅”：壬之甲骨文為；寅之甲骨文為”，《甲典》謂之“會意不明”，此處疑為寅之異構。壬寅是干支紀年；邦為邦社，邦方。卜辭中有：“癸亥卜，王其牽邦（），戊午，王受又又”（見《甲典》）之文例，意在卜問征伐邦方之凶吉。“邦”與“壬寅”之文刻於此印之上可能是用以記錄商王




在壬寅年間征服邦方一事。



圖四釋文： 卜扶狩又勺牛亡禍。


“”：可能為族徽。

“卜”：甲骨文為 、，意為占卜，即灼龜見兆，以斷吉凶禍福。


“扶”：甲骨文為 。《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中將其釋為扶，取人以手扶物之意。于省吾先生釋為引，取其形似一人執弓在手卻又引而不發之意。從前說，釋為扶。是人名，為武丁時期之貞人。《甲典》中可見文例：“癸未卜扶()彫邾父甲”。



“狩”：甲骨文為 。Y 為狩獵工具干，印文作 ，形如箭簇。也為狩獵工具，疑  為狩之異構。

“又、勺”：又，甲骨文為 ；勺，甲骨文為 。又、勺同為祭祀名，通常連用。連用時其順序多為又勺。卜辭中有“己巳貞王又勺伐於且乙其十羌又五”的文例(見《甲典》)。



“牛”：甲骨文為 。


“亡”：甲骨文為 、。



“禍”：甲骨文為 。這是一條卜辭，由貞人引卜問商王武丁田獵之凶吉。



圖五釋文： 午亥沌戡()犬下埜獲侑具。

“”：可能為犬方之族徽。




“午、亥”：午()和亥()為紀日，即從午日至亥日的六天。

“沌”：甲骨文為 。混沌，氣之混沌也，，又指水勢。此處作地名，如卜辭：“……在……沌往……王來正……方……人……”(見《甲典》)。




“戡”：甲骨文為 。，戡伐、克敵制勝之意。卜辭有文例：“八日辛亥允戡，伐二千六百五十人在灋”(見《評康殷文字學》)。是記載一次戰役的重大勝利。




“犬”：甲骨文為 、。犬在此為方國名，如卜辭文例：


“貞犬追亘又及”(見《甲典》)。





“下”：甲骨文為、。此印文作，與後來的金文和秦篆的下字相似，故而有超越年代之疑。事實上，甲骨文發展到商王武丁時期已有一千余年的歷史。一九八六年《光明日報》就曾報道過在中國西安市郊所發掘的、屬於龍山文化晚期範疇的原始社會甲骨文，距今大約有四千五百年到五千年之久。至商王武丁之時，甲骨文已發展得相當成熟。林氏《世陽堂》的商代古璽印文表明，當時的印文是甲骨文和金文同時并用的；例如圖七的寶、納二字，圖八的共、佐(左)二字以及圖十的戈字都可能是受到了當時金文的影響。

另外也有一種可能是當時製印時使用的是時下所流行的包括金文和青銅器銘文在內的各種文字。鑒於考古發掘已表明殷人早在商代後期已經採用毛筆寫字，而且形體變化多端，故而林氏《世陽堂》珍藏的商代古璽之印文正是代表了商王武丁時我國古文字所具有的多種形式，或者可以說一千年後產生的秦篆便是由林氏這十二枚商代古璽的進步印文發展變化而來的也未可知。關於這個問題，以下我將結合具體實例加以探討。

“竝”：甲骨文為，，；即并立之形，併也，此處為人名，指武丁時的一位重要將領。卜辭中有文例：“丁巳卜貞，王令 十商伐”(見《甲典》)。







“”：疑為獲字。甲骨文獲與隻同文，均為、，意為獲取。

“侑”：甲骨文為。侑，疾也，速也，奪取也。此處當釋為奪取。



“貝”：甲骨文為；金文為、，此處作。貝為貨幣、財物、財寶等。此印文的大意是商王武丁派其重要將領 帶領軍隊戡伐犬方，經過午日至亥日的六天戰鬥，大獲全勝，并得到了不少財寶。





圖六釋文：吹齊 侑夕疑片方。



“吹”：甲骨文為，此處為方國名。


“齊”：甲骨文為、；金文為、、。此處作，取其齊一之形，為地名。

“采”：《甲典》謂為字形結構不明。為殷之祖先名或祭名。

“侑夕”：侑之甲骨文為；夕之甲骨文為。侑通甸，有週遍之意。侑夕為合文，即通夕。疑與祭祀有關。



“疑”：甲骨文為、。此璽文為，是人名或方國名。卜辭中文例為：“癸卯卜𠄎()貞甸亡禍”(見《甲典》)。



“片”：甲骨文為、。為方國名。

“方”：甲骨文為。方國名。

此璽印文多為方國名、地名和人名，其意不明，有待於進一步考釋。

圖七釋文：寶納其年。

“寶”：甲骨文為；金文為。






“納”：甲骨文丙、內、納同文，均為。金文為。此處讀納。



“其”：甲骨文為；金文為。



“年”：甲骨文為、。




這是一枚吉祥語印。

圖八釋文：九共佐效妣庚二牛十怪獸歸亘屯。

“”：為方國名，卜辭文例：“己巳貞，伐方受又”(見《小屯南地甲骨考釋》)。疑即。

“九共”：甲骨文為；金文為。九共原為《尚書·虞書》篇名，共九篇，已佚，只在《尚書》中保留篇名。其主要內容是記述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以及貢賦政教等。此處“九共”借指各諸侯方國。




“左”：甲骨文為；金文為。古時左佐相通，此處為佐。



“效”，甲骨文為。“妣庚”：妣，比妣同文作。庚作。

“妣庚”：當為小乙之配。卜辭文例為：“庚午卜，貞：王賓小


乙夷妣庚

日，亡尤？”（見《商代周祭制度》第96頁）。在商代世系中，曾有四位先王之配的廟號為妣庚，并被列入周祭；其廟號分別為：示壬夷妣、祖乙夷妣庚，祖丁夷妣庚和小乙夷妣庚。小乙為伍丁之父，此處之妣庚應當為小乙之配無疑。

“二牛”：牛，甲骨文為；二牛之合文為。此處為美觀，將二分左右成對稱為。


“十怪獸”：此處繪一獸形，蓋因殷之先民對這十頭怪異的野獸不知其名，故而以圖代之。正像我們今天對“罕達犴”稱之為“四不象”一樣，這里暫以“怪獸”名之。圖中的“”代表十，因甲骨文以一當十。此圖應為十頭怪獸之表象，由此可見商代象形文字之痕跡。








“歸”：甲骨文為。

“亘屯”：為亘屯二字之合文。






這是一枚記事印，將各方諸侯佐效小乙之配妣庚所進的貢物一事記載下來。

圖九釋文：卜令從十夷。

“”：可能是族徽。

“夷”：甲骨文尸夷同文，均為、、、，夷為後起字。夷人多為蹲居，以長髮曲體為其特征，此處作，是之誇張，為長髮曲體之典型。卜辭有：“庚戌卜，令從伐”。（見《評康殷文字學》）。可見此璽之印文也是一條卜辭，其內容是商王征伐夷方之前用十名夷人為牲，祭拜祖先，卜問凶吉，祈求祖先之庇祐，以奪取戰爭之勝利。夷為殷之敵國，終殷之世，殷王朝與夷方的戰爭不斷，但一直未能征服夷人。

圖十釋文：戈使十人。

“戈”：甲骨文為、，金文為、。戈為族徽，又為方國名，如卜辭“寅卜王夷戈田者亡”中的戈即屬其意。（見《甲典》）。一九九八年一月八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報導青銅器之鄉周原地區出土一口青銅大鼎，器內有“戈父己”

三字銘文，戈字比其它兩字為大。据專家鑒定認為，戈為族徽，父已為作器人名字。《世陽堂》這枚古璽印文的戈字也比其它三字為大。此處戈為族徽，同時也為國名。

“使十人”：三字為合文。甲骨文史、使、吏、事同文，皆作，，此處讀音為使。甲骨文為十人之合文。“戈使十人”，是指商王武丁派往戈方之使節。此為憑信璽印，其中有兩個如人形的肖形符號，其意未明，疑是奉節出使之意。

圖十一釋文：寶 扶旅武丁餽冊。

“寶”：金文為。

“檢”：即檢，即異（見《精編金石大字典》）。檢同擒，以手捉物也。

“扶”：金文為。扶，從又（手）從夫，甲骨文則以大，夫、天同為一字，是為人形，作、、、、。此璽印“扶”有如人以手扶物，疑為扶字之初形。

“旅”：金文為、，此璽印文疑為旅之增繁。

“戊丁”：戊，金文為、、。丁，金文為、、。戊丁同為天干，與甲子相配不合，顯然不是紀年。如為紀日，與上下文不合。甲骨文常有“依聲借字”，“同聲通假”的情形。如凡庚即盤庚，又作庚、盤庚之合文。實為武丁二字之合文。戊與武之上古聲母同為明母，發音相近，為通轉假借之字。丁是借用下文之“口”為之。）

“餽”：金文為，甲骨文為、。餽，鼎實也，八珍之膳。卜辭文例：“丁酉爭貞來丁來餽（）王”（見《甲典》）。爭為武丁時之史官，王是指武丁王。餽王即武丁之宴飲。



“冊”：甲骨文和金文均作，為作冊記載之意。《尚書·多士》謂之：“唯殷先人，有冊有典”。此方商代古印便是佐證。這枚古璽印文的大意是商王武丁所得到之寶物、他的諸如祭旅、軍旅、田獵與巡守等重大宮外活動、以及他所參與的重要

宴飲，凡此種種，都要一一造冊記載。按照商代慣例，日名為商王死后之廟號，故武丁便是廟號，這方璽印疑為武丁死后由貞人整理他的一生事迹記入史冊。

圖十二釋文：○○ 龍 虎。


“拴”：參見圖十一釋文。

“龍”：甲骨文為、；金文為。

“虎”：金文為、。龍虎，宜讀為拴龍拴虎。此枚古璽亦為吉祥語印，用以顯示商王武丁之威嚴。

上述的十二枚古璽之印文，歸納起來，可按其內容分為以下四類：

一、冊命類：


圖一： 王令：納妹夬、婦，允不亡有。

二、憑信類：


圖十：戈使十人。


圖十一：寶拴、扶旅、武丁餽冊。

三、記事類：


圖二： 戊庚從舟狩羊。

圖三： 邦，壬寅。

圖四： 卜引狩又勺牛亡禍。

圖五： 午亥沌戡犬下 獲徇具。

圖六： 吹齊徇夕疑片方。

圖八： 九共佐效妣庚二牛十怪獸歸亘屯。

圖九： 卜令從十夷。

四、吉祥語類：

圖七：寶納其年。

圖十二：  龍拴虎。

拴

二、商王武丁古璽之特色

根據以上的古璽印文我們可以確定林氏《世陽堂》這十二枚早期中國古璽是商王武丁之遺物。其主要依據包括：

1. 有四名貞人是武丁時期的，如圖一的爭、妹、內、婦與圖四的扶。據有關專家考證，武丁當時有七十三名貞人，爭、妹、婦、內、扶五人均在其中。

2. 圖五的 是武丁時期的一名重要將領。商王曾派他率領軍隊征伐犬方。

3. 圖九中有武丁的母親，小乙之配妣庚之名字。

4. 兩條卜辭(圖四與圖九)及一條驗辭(圖一)都直接與武丁時期的政治、軍事和田獵活動有關，為當時古璽印文所特有之內容，而這一切都是後世的古璽不可能具有的。

林氏所收藏的商代古璽，除了其印文的內容直接與武丁時期密切相關之外，亦在材質、型制、印文款式的安排、紋飾、字體和藝術特色等諸多方面具有極為鮮明的時代特征。以下筆者將根據這些特點及其對於後世的深遠影響逐一加以說明。

(一)材質與型制

骨璽：傳世和出土的古璽大致包括金屬與非金屬兩大類。金屬的有青銅、黃金、白銀和鐵等，其中以青銅古璽為一大宗。非金屬古璽由玉石、瑪瑙、琥珀、石、木與骨角刻制而成，其中又以石璽為大宗。在傳世的古璽中，唯有骨制之印甚為罕見，即使偶然有幸可得，終不過是鳳毛麟角。

因此，有如林氏《世陽堂》這般豐富和完美的稀世瑰寶確可謂是亘古之所未聞。這套商代包括了十枚堪稱中國骨璽之最的商王武丁之璽印，在型制上有方形和鐮形，分別代表了我國古先民的天圓地方觀念和源於原始農器的思想意識。

林氏的商王武丁骨璽，無論是方形還是鐮形，大都設計為無鈕式的龜背形。其中唯一的例外是圖七，這一印璽由於采用的骨料不同(可能是獸之脛骨)而因材施制地刻成凹背之型。十枚骨璽的型制和規格可以分類如下：

圖一：鐮形，6.2X4.8 厘米，厚 2 厘米；

圖二：鏟形，5.7X4 厘米，厚 1 厘米；

圖三：鏟形，5.7X3.7 厘米，厚 2 厘米

圖四：鏟形，10.6X8.8 厘米，厚 1.8 厘米；圖五：鏟形，6.3X4.5 厘米，厚 1.8 厘米；



圖六：方形：5.4X5.3 厘米，厚 2.2 厘米

圖七：方形，5.5X5.5 厘米，厚 2.1 厘米

圖八：鏟形，7X4.1 厘米，厚 1.8 厘米

圖九：方形，2.9X2.8 厘米，厚 1.8 厘米

圖十：方形，5.2X5.0 厘米，厚 1.8 厘米

林氏《世陽堂》的商王武丁骨璽正面骨質堅硬，背面則較為疏松。其質地如今雖已風化為蜂巢之狀，但仍然基本保持完好。璽印之文字也十分清晰。除去圖六的印文中有兩個字的筆劃剝落以外：如  (疑)右邊“丨”豎筆和  (方)右邊“丨”豎筆不全，其他的部分均完整無缺。剝落的兩個筆劃亦殘痕明顯，仍可辨識。此十枚骨璽在型制上方形和鏟形各有五枚。其鏟形璽的型制雖沒有為後世所沿用，方形璽的型制卻影響至深，迄今仍為各類璽印的基本型制。

玉璽：圖十一和圖十二均為白玉所制之璽。

圖十一：正方形，規格為 10.2X10.2 厘米，厚 2.8 厘米；

圖十二：此枚古璽型制特殊，由一個鏟形和兩個圓形組成。規格：9.2X6.0 厘米，厚 1.0 厘米。










林氏這兩枚商代玉璽也設計為無印鈕式龜背形，上面有二至四個小孔。圖十一背面還刻有一組由一張撒開的魚網間以雷雲紋所組成的精美紋飾，其風格飄逸靈動，典雅異常。一般來說，網紋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時期的陶器紋飾。商代早期青銅器也有網飾，後期則較為罕見。因此，這一商代璽印紋飾應該說具有十分鮮明與典型的時代特色，同時也為我們推斷這枚早期玉璽所產生的年代提供了重要佐證。

綜上所述，無鈕式龜背造型應是林氏《世陽堂》所藏的商王武丁古璽的一大特色。其原因大概是由於璽印在當時屬於一種重要的佩飾或護身。以圖四為例，其內容為一條卜辭，是專為商王武丁祈求祖先保佑他田獵時無（亡）禍而制，相當於



後世的“出入平安”，“大幸”等類似吉祥之語。林氏所藏的商王武丁之古璽均無印鈕，僅於背面上鑄有二至四個小孔，也是為了佩戴之便。根據史料所載，鈕制大約始於西周初年。隨著璽印的社會功能不斷提高，人們為了使用方便才在印章上增加了便於提取和壓的簡單印鈕。而後，印鈕的制作開始體現出古人對於美的追求和對於雕刻技術的精益求精。多種形式的印鈕如雨後春筍一般地湧現，其造型有鼻鈕、柱形鈕、瓦鈕、直形鈕、肖形鈕、人形鈕、獸形鈕、橋形鈕等，應有盡有，不一而足。鈕制的出現代表了璽印制作的一大進步，使之更其完善地發展成為一個獨特的藝術門類。

(二)林氏商代武丁古璽款式的靈活多變性

林氏《世陽堂》的這一套商代古璽在款式方面包括順文、倒文、合文、對稱式等多種多樣的構圖。這些構圖可以以綫條表現如下：

- 圖一  順倒順
- 圖二  順倒順
- 圖三  順
- 圖四  順順倒順
- 圖五  順
- 圖六  順
- 圖七  順
- 圖八  順倒順
- 圖九  倒順
- 圖十  順橫
- 圖十一  順
- 圖十二  順重

從以上用綫條所表示的款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十二枚古璽的印文排列是以順文為主，然而卻極其富於變化。這一法無定法、卻又有規可循的靈活多變的風格是與當時的甲骨卜辭互為影響的，因卜辭中也常運用合文、倒文和璽文等不

同形式，只是這些形式在林氏《世陽堂》的商王武丁古璽中使用得更加靈活而已。《世陽堂》商代古璽所揭示的這一特色也可以說為我們考釋這十二枚古璽印文提供了一個行之有效的研究方式。我在考釋林氏商代古璽時最初遇到過不少困難，後來都是遵循著這一門徑尋求解決辦法的。例如圖一的“”，起初我是當作一個字理解，查考了很多資料都無法釋出來。後來，我又從合文方面去考查，終於將“”釋為“允不亡”三字之合文。

此外，當所有印文都已考釋出來時，如何能較為正確地理解其大意呢？如果按一般釋讀常規由上而下，由右至左去讀，有些印文便讀不通。遇到這種情況就要按照靈活多變的方式處理才能通達。以圖九為例，要先倒讀後順讀才能得到正確的內容。此文讀為“卜令從十夷”，與卜辭的文例“庚戎卜，令從旌伐夷”相似，由此可知這一讀法是正確的。林氏所珍藏的商代古璽這一順文、倒文及對稱式兼而并用之特色對於後世璽印的影響可謂是極其深遠的。例如，“亞羅·示”一印的款式便採用合文。戰國秦漢期間，璽印靈活多變的款式則包括橫文式的“杜陽左尉”及斜文式的“曲陽左尉”、“左廡將馬”、等等。對於這一切我們只有把握了古璽印所具有的多種變化才能正確釋讀和理解印文。

(三)古璽印文字體

《世陽堂》所藏的商代古璽多為陽文，唯有圖十二為陰文，可能與當時青銅器的銘文為陽文不無關係。這十二枚古璽的印文基本上為甲骨文，同時也有金文，或是甲骨文與金文混合使用的情况（如圖八中的“共”、“左”以及圖十中的“戈”均為金文字體）。由此，可以斷定在商王武丁時代甲骨文與金文是同時并存的兩種字體，而林氏的商代古璽印文在當時則又屬於兼收并蓄、較為進步的文字。從這套古璽的印文來看，當時的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和古璽印文）應當說已經相當成熟，部分甚至已基本定型。關於這一點，我參照李圃先生的《商周六國秦漢文字對照表》選取了一些字體相近的字加以比較，并列

表說明如下：




殷商	二	二	禾	牛	冊	子	令	印	水	谷	門	至	材	用	羊	令	美
兩周	二	二	禾	牛	冊	子	令	印	水	谷	門	至	材	用	羊	令	美
山	二	二	禾	牛	冊	子	令	印	水	谷	門	至	材	用	羊	令	美
八	二	二	禾	牛	冊	子	令	印	水	谷	門	至	材	用	羊	令	美
國	二	二	禾	牛	冊	子	令	印	水	谷	門	至	材	用	羊	令	美
秦	二	二	禾	牛	冊	子	令	印	水	谷	門	至	材	用	羊	令	美
漢	二	二	禾	牛	冊	子	令	印	水	谷	門	至	材	用	羊	令	美
楷	二	二	禾	牛	冊	子	令	印	水	谷	門	至	材	用	羊	令	美
書	二	二	禾	牛	冊	子	令	印	水	谷	門	至	材	用	羊	令	美

以上所列舉之範例清楚地表明；我國古代漢字從商。周、六國以至秦漢都是一脈相承的，有些字甚至相似到難以分辨其時代先後的地步。難怪乎甲骨文被一些學者稱之為“篆文流傳於今世之最古者也，”這一說法可謂是不無中肯之處。因此，林氏的商代古璽中所出現的有如後世之篆文者（如圖一中的令為“

”、圖五中的下為“ ”）非但不是超越時代，而恰恰正是為古印文後世的發展變化提供了依據；從而也證明了秦在統一六國以後試行“書同文”所現的小篆絕非無水之源，而是由甲骨文、金文、古璽印文以及六國文字發展而來的。

《世陽堂》商代古璽印文的另外一個特色體現其增繁和借用偏旁筆劃方面，如圖三的邦（ ）是 的增繁；圖十一之丁字是借用下文的（ ）之，“ ”而為之。對於我國古璽印文這一特色，羅福頤先生在《古璽匯編》的序文中也曾指出：“古璽文……恆增損筆劃，變易形體。”羅先生當年所提出的這番見解與《世陽堂》的商代古璽印文特色恰相符合，足可見商王武丁這套璽印對於後世的影響之深遠是無可估量的。

（四）族徽和方國名為林氏所珍藏之商代古璽的又一特色

目前印學界流行的認為古璽起源於族徽的說法是不正確的。以《世陽堂》的十二枚商代古璽而言，其中雖然有八枚在顯著的部位刻有徽記、族徽和方國名，然而印文始終都是占主導地位的，族徽則只是起到一種修飾印文的作用。例如圖一中的“ ”乍看上去好似一個頭著冠冕、五官端莊的帝王之像，仔細端看的話卻又象是一個“酋”字於字面上則蘊涵著首領之意，故而這一特定形式的設計極可能便是商王武丁的徽記。此外，也有一些族徽本身即印文的情況，例如圖二中的“ ”和圖十中的“ ”便具有這種性質；由此亦可知這一套商代古璽的徽記與印文相互照應并溶為一體的。鑒於上述事實，應該

說將我國古璽印之起源歸於族徽的觀點是缺乏佐證和無法立論的。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只能說族徽與印文同時代表著中國早期古璽的一個典型特色，但族徽卻並非古璽印所產生的根本因素。

三、商王武丁時代的篆刻藝術風格


古人刻印一般都不記姓名。戰國秦漢時期印學大盛。然考其作者，卻是無一可獲。相傳秦之傳國玉璽為李斯所篆和孫壽所刻，但此印不傳，此說便難以證實。一些散見於典籍者如魏晉間的陳長文、韋仲將、楊利從、許世宗、和宗養等，均以工於篆印而得名。唐代至元，米芾、王銑、趙孟頫、錢選、王冕等據傳也曾自制印章，不幸的是終因沒有實物傳世，此類傳聞的真實與否亦無從查考。至明代嘉靖年間，文彭治印而卓然成家，自從開始創了清印學之先河。於是乎皖派、浙派、鄧派、歙派先後興，一時間篆刻風起雲湧。藝術風格各有千秋。

文彭之前，璽印傳之於世者難以數計。然而究其制作者卻空無一人，不能不說是印學發展史上的一大缺憾。長期以來，如何填補這一空白已成為印學界的一個頭等重要的課題。正因為如此，林氏《世陽堂》商王武丁古璽之發現在考古研究和印學考證方面才不僅標志著一種實質性的重大突破，同時也具有著極其深遠的現實和歷史意義。

筆者在考釋林氏的商代古璽印文時發現這十二枚璽印均為商王武丁的貞人(史官)所制。其主要依據與理由如下：

1. 圖一、圖四和圖九的內容均為卜辭和驗辭。與其他甲骨卜辭一樣，這三條卜辭和驗辭都是由貞人占卜後才刻寫上去的。在當時，刻寫卜辭和驗辭是貞人的職能之所在，任何人無法取而代之。

2. 一條完整的卜辭，按照其慣例和程式，一般要由四個部分組成。它的第一部分名為“前辭”，用以記錄占卜的時間、地點以及占卜者的姓名；第二部分為“命辭”，紀錄向龜陳述卜問的過程；第三部分是“占辭”，即觀看卜兆以斷成敗凶吉的言

辭；第四部分則是“驗辭”，記錄的是占卜後應驗的事實。以此格式對照分析圖四的印文內容，知“扶”不僅是這條卜辭的貞人。同時也是此枚璽印的刻制者。

3. 圖二、圖三、圖五和圖八之內容均為有關田獵、軍隊征伐、諸侯方國進貢等各方面的記事。紀錄這些重大事件應屬於史官（貞人）職責範圍。因此這些古璽印亦理所當然應由他們所刻。

4. 圖十一造冊記載了三項重要內容：（1）寶檢，即商王武丁所得到的寶物；（2）扶旅，即商王武丁的重要宮外活動，如軍旅、祭旅、巡守等；（3）武丁餼，即武丁所參與的重要宴飲。記載此類大事都應屬於史官的職能範疇而由他們刻制印璽、鈐蓋貯存或轉徙，也是順理成章之事。

至於其他幾枚吉語璽印，從其材質和型制相同以及文字相像等特征來看，亦可斷定俱出自於上述商王武丁史官之手。

武丁時期的史官（貞人）是經過嚴格訓練的。《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書收錄了一些“習刻”，但這些只是初學契刻者練習之作，並非正式的卜辭。習作者經過堅苦而嚴格的訓練之後，其中成績優異者由商王親自授命方可成為一名參與祭祀、占卜和刻寫卜辭等活動的正式貞人（例如圖一中的爭與埽便是由商王武丁親自授命納為貞人的）。

在現已發現的甲骨卜辭中，有不少是由爭與埽二位貞人所占卜和契刻的。《史記·殷本紀》中記載：“武丁即位，思復興殷。未得其佐。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舉以為相，殷國大治。”《史記》這一記載是否屬實，仍有待於進一步考證。然而商王武丁思賢若渴和重視人才卻是不爭之事實。據陳夢家先生統計，武丁至帝辛的二百七十余年期間，史官（貞人）共達一百二十一人，而其中屬於武丁時期的便有七十三人之多。事實上，實際的人數大概要一倍於陳氏所統計的數目，武丁時的人大約是一百多人，均由商王本人親自授命，這一點圖一便可作為一個強而有力的佐證。

武丁的貞人多才多藝、各有所長，而且共同具備了高超與嚴謹的契刻技能。從林氏所藏之璽的印文契刻風格來看，這些

貞人的技法嫻熟，操刀如執筆，且能寓章法於刀法之中。其字體筆劃或長短粗細，或大小輕重，或疏密斜正，或參差行頓，變化雖多卻渾然一體。例如，與風格雄奇渾厚的圖十一和沉凝莊重的圖十二相比，圖八的刻法則顯得圓轉流動，有如春花舞鳳。作為我國最早期篆刻藝術家的武丁貞人們還格外重視對稱美，這種觀念在圖一、圖二、圖四、圖五和圖八的對稱式鏤形璽印設計中均得以體現。此外，貞人們所刻的印文字數雖多，卻有條不紊和主從分明，給人以一種強烈的和諧勻稱之美感。總而言之，林氏《世陽堂》所珍藏的商王武丁之古璽不僅具有重大的歷史價值，同時在藝術造詣上亦達到了極高的境地。

基於筆者上述的考釋與分析，可以證實我國璽印的歷史至少已有三千三百年之久，而商王武丁則是首開使用璽印之先例的中國古代帝王。根據這一史實，出入於武丁左右的商代史官（貞人）亦應被視為中國最早期的篆刻藝術家，其中又以貞人引為衆多史官之代表（圖四為引的精美篆刻之作）。這一嶄新的印學考證收獲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印章發展史上長達兩千多年的“見物不見人”之狀況，對於我們進一步深入探討和研究中國璽印的起源、發展與變化必將產生無可估量的深遠影響。與此同時，由於林氏所藏的商王武丁古璽在型制和內容等諸多方面都是與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屬於我國古先民的直接藝術創作，故而目前所流行的那種認為中國古璽最初應起源於古蘇美爾人的陶制圓筒形印章的觀點則顯然是毫無根據的。

海外《世陽堂》的商王武丁之古璽為林緝光先生於五十年代偶然所得并珍藏至今。這十二枚堪稱為中國璽印之最佳的商代古璽四十年來首度公諸於世，不僅是印學界的一件大事，同時也必然會引起古文學界、考古學界和歷史學界的強烈關注與反響。鑒於筆者水平有限，加之參考材料不足，對於《世陽堂》所藏之商王武丁古璽的考釋尚且十分片面和膚淺，謬誤之處亦在所難免。在此衷心希望廣大的印學界同道及印學愛好者們能不吝賜教，以期使這一有關我國最古老璽印的

研究得以更其深入的進展。

作者簡介

伍錫強，男，歷史學家、中國歷史、古文字專家、中國藝術品、文物收藏家和鑒定專家。

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八五年為廣東省中山大學圖書館善本室主任。一九八四年為華南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教授。

一九八五年移民美國，繼續研究中國古代史學和古文字學并寫成本文《紐約林氏世陽堂藏中國商王武丁古璽之發現》專論，為海外中國考古學界和古文字學界專家們所觸目。同時，本文已預定在《美國文摘》(U.S.Digest)雜誌九九年五、六月號發表，為中國進入二十一世紀古代璽印的研究標志着重大的實質性突破和對後世極其深遠的和無可估量的影響。

著述：除本文外，并有《康有為對朱熹理學的批判》，《翁山詩外》校等